

我们过得还行

ES GEHT UNS GUT

von Arno Geiger

[奥地利] 阿尔诺·盖格尔 / 著

陈 民 / 译

刘 新 / 校

上海三联书店

我们过得还行

ES GEHT UNS GUT

von Arno Geiger

[奥地利] 阿尔诺·盖格尔 / 著

陈 民 / 译

刘 新 / 校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过得还行 / [奥地利]阿尔诺·盖格尔著; 陈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6

ISBN 978-7-5426-2603-5

I. 我… II. ①阿…②陈… III. 文学—德国—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582 号

我们过得还行

著 者/[奥地利]阿尔诺·盖格尔

译 者/陈 民

校 者/刘 新

责任编辑/戴 俊 王笑红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研 发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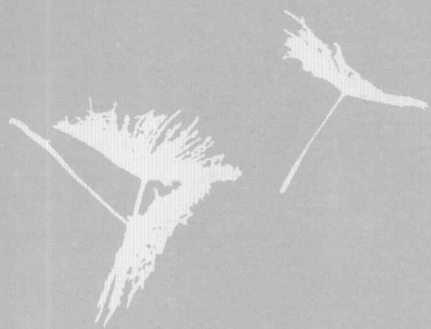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6.25

ISBN 978-7-5426-2603-5/I · 333

定价: 32.00 元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Arno Geiger

Title: Es geht uns gut

Copyright ©2005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上海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2006-351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2001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1)
1982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二	(7)
2001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三	(28)
1938 年 8 月 6 日, 星期六	(35)
200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日	(55)
2001 年 5 月 1 日, 星期二	(60)
1945 年 4 月 8 日, 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62)
2001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81)
1955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二	(89)
2001 年 5 月 3 日, 星期四	(116)
2001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119)
1962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六	(121)
2001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143)
1970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四	(150)
2001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176)
2001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五	(182)
1978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五	(186)
200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五	(213)
2001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218)
1989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一	(222)
2001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三	(244)

2001年4月16日,星期一

他从未想过什么叫死人比我们更长命。他朝后仰了仰头。他还闭着眼睛,就看到自己又站在卡住的阁楼门边,听到透过木头传来的低沉叫声。星期六到的时候,他就发现西边山墙下的窗户少了一块玻璃,那里常常有鸽子飞进飞出。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开始用肩膀撞向阁楼门。每撞一下门就打开几公分的缝,门后的翅膀扑击声和咕咕的叫声也越来越大。门轴发出了一声短促、刺耳的吱呀声后,阁楼里刮起一阵阴风,门开了一条大缝,菲利普终于可以将脑袋伸进去。尽管光线昏暗,他只看眼就感到恐怖至极。许多鸽子在里面筑了巢,到处都铺着厚厚的垃圾,垃圾都快要没膝了,一层又一层,就像“利滚利”越堆越多:粪便、骨头、蛆、老鼠、寄生虫、病原体(结核病菌?或者沙门氏菌)。他攸地缩回脑袋,门随即啪嗒一声关上了。他查看了几遍,确认插销已经插紧了。

约翰娜是从电视中心过来的。这个船形的建筑物就在附近的屈尼西勒贝格,在希琴公墓和精心设计的美泉宫花园的上方。她把那辆菲利普多年前转让给她的载重自行车靠在早上运来的垃圾箱旁。

“我带来了早餐”,她说,“但是你得先领我参观一下房子。嗨,快点。”

他知道这不仅是对此时此刻的提醒,也是对所有事情的要求。

菲利普坐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他从冬天死去的外祖母那里继承了这栋别墅。他眯着眼打量了下约翰娜,然后套上鞋子。他用拇指和食指将抽了一半的香烟随意地(有针对性地?)弹进还空着的垃圾箱里,说:

“到明天它就会满了。”

我们过得还行

然后他站起身来，走进敞开的大门来到走廊，从走廊来到楼梯间。和一般传统的楼梯间相比，这里的楼梯宽了许多。约翰娜摊开手一遍遍地抚摩着那颗有了年头的炮弹，它是由多细孔的合金灌造而成的，就搁在楼梯扶手末端的栏杆上。

“这是从哪儿来的？”约翰娜很想知道。

“这可把我问倒了。”菲利普说。

“哪儿有这种事，外祖父母在楼梯栏杆上摆着一颗炮弹，竟然没有人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大家之间平常就没什么话说呢……”

约翰娜盯着他说道：

“全怪你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菲利普避开她的目光，向左走到一扇高大的门前。打开门，走进客厅。约翰娜跟在他后面，皱了皱鼻子，半明半暗的空间里散发出一股污浊的气味。菲利普拉起两扇百叶窗，好让房间显得舒服一些，他觉得那些家具在突然照进来的光线中似乎在微微地晃动。约翰娜走向挂在书桌上面的摆钟。指针停在差二十分七点。她试图听到嘀嗒的声响，显然是徒劳的，于是她问起这只摆钟是否还好用。

“答案不会让你感到惊讶的。我不知道。”

他连发条钥匙放在哪里都想不起来了。尽管可以假定，如果给他的点时间好好想想，他也许会回忆起保管的地方。他和姐姐茜茜，这次姐姐继承的是两份人寿保险和一个位于下奥地利州的糖厂的部分股份，他们俩七十年代在这里住过两个月，那是在他们的母亲死后那个夏天，那时也只能这样。当时外祖父所在的电力部早已由他人接手了，可他整天还端着个架子跑来跑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每个周六的晚上都给他的钟表们上发条，把这个仪式当成了艺术品展示，允许外孙、外孙女在旁观看。这样才显得时间好像在这个老人的控制之下，是他让时光流逝或是停留。

菲利普看着挂在摆钟两侧的照片，就是在书桌上方的。这时，约翰娜打开钟盒，往里看看，——好像一只猫朝昏暗的靴子口里张望。然后她又接连拉出书桌的小抽屉。

“这是谁？”她一边忙乎一边问道。

“右边的是我舅舅奥托。”

对左边的照片菲利普什么也没说。约翰娜也应该明白了。他从墙上取下照片，拿到近前仔细地端详。那是他的母亲，1947年时，她十一岁，站在电影

《枢密官盖格尔》拍摄现场的不远处，凝视着流淌的多瑙河。一艘游船正在向下游驶去，船尾冒出燃烧柴油的浓烟。画外是瓦尔德劳特·哈斯在齐特琴的伴奏下演唱的玛丽扬德尔-扬德尔-扬德尔。

“后来你母亲还想当演员吗？”约翰娜问。

“她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没来得及问她。”

他也不知道，除了问母亲还可以问谁。父亲只会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自己也没有决心继续刨根问底，也许他根本不想问下去。对母亲了解甚少，让他感到不快。一旦想到自己必须花费多少想象力才能设想出事物曾经可能是怎样的时，他就觉得每一次的思考都拙劣至极，令人感到压抑。

他驱散脑中的思绪，开口说话，好让约翰娜听见：

“我还是觉得她们大家都有点儿像演员。都是那种瓦尔德劳特·哈斯的类型，金发、和善、乐观。只是这些男人不像乡土电影中的男人。我想这是一出特别的悲剧。”

“后来呢？”

“这件事我早就全说了。我父母的婚姻算不上幸福。后来相当糟糕。”

他停了一下，趁机把手伸进约翰娜的脖子里。

“我觉得想要在这里追忆特别没有意思，我更愿意想想天气会怎么样。”

菲利普亲吻着约翰娜，没有遭遇反抗，也没有回应。

今天的天气就装在约翰娜的脑袋里，未来几天的天气一定可以从她包里的打印件、表格和电脑模拟图中推断出来。

“思考天气，不去想爱情不去想遗忘不去想死亡。”

“其他你还能想起什么来？”约翰娜，这个气象小姐似笑非笑着问，一边半嗔半怒地摇摇头。这正符合菲利普对她的了解，他感觉有一刻离她近了。他一样似笑非笑，但却面露愠色地耸耸肩膀，好像为他无法给出、抑或不想给出更好的答案表示歉意。

“我能说什么？”约翰娜继续说道，“对家庭毫无热情在你这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另一方面，菲利普多次试着让约翰娜明白，她看问题的角度并不完全正确。说到底这也不是他的错，是大家忘记了及时让他提起对家庭的兴趣。

“我和家里的关系维持在我还能接受的程度。”

“像减肥拒食。”

“就那样吧。”

他把照片重新挂到挂钩上，照片上的母亲还是个小姑娘。他这么做暗示他更愿意继续让她参观别墅的其他房间。他走到门口，回头看看约翰娜，她摇了摇头。反对？失望？那好吧，经验告诉他，有时候说话就像是对牛弹琴。忍了吧，他想。约翰娜盯着他看了看，她想问菲利普是否可以摆钟送给自己。

“我没意见。”

“也许你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东西？”

“不，我甚至都没有兴趣把它拿去送人。”

“那就算了，天哪，我也不是非要这个不可。”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了。”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太对了。”

又来到楼梯间，男主人的书房、缝纫间、阳台、楼梯间，铺着地毯的台阶，两只手匆匆擦过炮弹，在所有体面的家庭里，它都标志着一个开动回忆的起点。

菲利普现在想起的就是，在与外祖母为数不多的相处中，一次外祖母曾经斥责他，如果他下次再不听话，就要把他放到炮弹上射回给土耳其人。这个恐吓一直还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带着外祖母说话的腔调，仿佛她的声音犹在耳畔。

他们在楼上到处走了走，回味着刚才的口角，匆匆地，没有多说什么为各自辩解，这说明他们都饿了。接着，又到了楼下。约翰娜帮着在厨房收拾桌子，一切还是菲利普刚来时的样子，浅蓝色果盘里还摆着完全腐烂了的苹果。不过，约翰娜坚持到外面吃早餐，就在别墅前的台阶上。这时候外面相对更暖和些（在这个难以置信保存完好的、由别墅和无人行走的人行道组成的地区）。可约翰娜还是去拿了个垫子垫在下面。他们坐下，菲利普把腿伸出去，约翰娜则紧紧蜷起双腿。菲利普试着缓和刚才参观时引起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他谈起半腐烂状的椅子，这些椅子分布在花园墙边的好几处地方，非常不可思议。每把椅子都面向每个邻居的院落，在上面可以向邻居家看出去。菲利普向约翰娜汇报地窖里还有多少蜂蜜和多少种自制的果酱。

“我不喜欢果酱”，约翰娜撇了撇嘴，说话的兴致不高。

她把橄榄核吐进垃圾箱里，听着核撞击在龟裂的金属上传出的回声。这时的菲利普心绪不宁，他不想表露出来，他观察着鸽子打发时间。这些鸽子朝着联邦首都的文物古迹飞去，或是飞到最近刚刚属于他的阁楼上，来来往往，忙忙碌碌。

“荒唐，”过了一会儿他嘟囔道。

点点头又说了一遍:

“真荒唐,疯了,不是吗?”

过了一会儿约翰娜要走了。她和菲利普告别,表示他们这样下去可不行,她的右裤脚上已经夹上了衣夹。

“典型作风,”约翰娜补充道,就在菲利普抬头望了望,好像准备回答,但又什么也没说出来之后:“没有答案,也没有兴趣,就像是对着你的亲戚一样。”

“这个我们也已经谈过。”

他不理解约翰娜想抱怨什么。毕竟是她做不到和弗兰茨分手。也是她,带着点傲气宣称自己生活在维也纳最好的、名存实亡的婚姻中,他不需要来两次只和他上一次床的情人。而这点菲利普向约翰娜抱怨过多次。

她嘲讽似地挑了挑眉毛,又一次道别,这次没有亲吻,她似乎想索回上次的吻。她要走了,就在这时菲利普抓住行李架抬起后车轮,约翰娜徒劳地踩着脚踏板。骑车的路线很简单,不需要路标,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可以想象的最平稳的路面上。一直向前,绝不会走错。菲利普不理睬约翰娜的抱怨:

“放手!放开,你这个蠢货!”

他没有放手,他感觉她的脚踏节奏好像手腕上跳动的脉搏。

“原地打转多好!从来也不用知道去哪儿!”

约翰娜疯狂地摁车铃。

“放手!”她喊道:“你这个混蛋!”

他看着她来回扭摆的屁股,想着,想了许多,想她的身体,想他们这次又没有性交,想他们在原地踏步,不是双方,至少他是。

“看啊!街上多空啊,地皮,站台!手,包,日子!”

“我得去上班了!我必须剪接胡萝卜丰收的图片。为了做晚上的天气预报!你做什么也没用的!想想天气!老天啊!别纠缠了!放了我!放……手!”

即便是打定主意做什么,菲利普认为,那也不可以紧紧抓住不放,不管放弃让人感到多么困难。他放下后轮,边跑边在后面用力推着约翰娜。约翰娜几乎失去平衡,不断调整着方向。菲利普和约翰娜穿过敞开的大门拐到街上,女邮递员赶忙让到一边。但事实上约翰娜按铃只是为了菲利普。

“再来啊!”他叫道,他已经跟不上她的速度了。他在后面向她挥手。自行车的钢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约翰娜摁着铃岔到第一条小巷子上,仍然摁个不停,

这时菲利普已经点上一支烟在想约翰娜为什么来看他。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他想不出结果。一方面他不想产生错误的期望值（他认为他人好，但头脑简单，所以她决定选择另一个人）。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太没礼貌（在这个天气晴好的星期一他可是有正经事要做的，而不是表现得很没礼貌）。他坐回到台阶上，大腿上放着外祖母的信件，这些信件还像以往那样送到，尽管收信人已经去世几周了，此时，他的脑子里转换了主题。

他幻想出一张虚构的班级照片：一共有四十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年龄大约都在六、七岁，不过，他们无论是出生年月还是长大的地方全都互不相同。一个男生成年后参加了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从那里带回了一颗炮弹。第三排靠门的那个男生就是菲利普的父亲，还长着乳牙。他的还是小女孩的母亲也在这个班里。叫阿尔伯特·施特劳哈尔的男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摔跤手，而叫尤里的是苏联指挥官的儿子。菲利普一排排地审视过去，他问自己：他们，所有这些天天都在增多的死者，后来都怎么样了？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和其他孩子一样两只白白的手放在前面的书桌上，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每次想要上厕所时都不敢说。她叫阿尔玛。她后来还很年轻时就嫁给了当时是电力企业的法律顾问，后来做了部长的那个男人。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儿子在1945年十四岁时死于维也纳附近的战场上。小的是女儿，在汉斯·莫泽尔和保罗·赫尔比格的电影《枢密官盖格尔》中露过脸。这个女孩也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学生。在照片上她坐在靠墙的第二排，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决定嫁给比她大六岁的小伙子，因此和她的父母闹翻了。那个小伙子呢？我们已经见过了，就坐在后面的凳子上，靠门的。一个不错的男孩，即使不一定是结婚的最佳人选。他年轻的时候发明了很多游戏，却因此而倾家荡产，尽管其中的一个游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谁了解奥地利？

那个，坐在靠窗的第一把凳子上的，就是我。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该怎么说自己呢？我已经费神思量了所有其他人，却没有因此感到更快乐，我又该说自己些什么呢？

1982年5月25日，星期二

半梦半醒中她注意到黑暗渐渐褪去，天色越来越亮了，日光钻进了满是深色家具的大屋子。要是有个自动装置能从床上开启一扇窗户，那可就方便多了：可以把陈腐的气息放出去，一股混合着呼吸、马毛床垫和烧糊了的牛奶的气味。她的丈夫在三天前将半升奶整整烧了八个小时，那时她正和她的文化小组同伴在卡尔克汪。在她回家的时候，牛奶都变成了黑糊糊的一团，锅里和炉子上到处都是。别提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用钢丝球和去污剂擦干净炉子（那个锅就直接扔进了垃圾箱里），她估计，糊味不会很快地从刚刚油漆过的房子里散发出去。她自己也许今天就闻不到这股糊味了，有可能，习惯了。但是每个走进房子里的人，鼻子里都会嗅到一股老人的气味，她担心。好吧，有可能是她太过于悲观地看待这件事，也许是她过于敏感，因为她意识到终有一天日子不再能够继续下去。指甲钳忘在冰箱里；他应该换下脏内衣，却在上面又套了件干净的；他曾经把套着塑料的比萨饼放到烤箱里。实际上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却让人害怕，她觉得很恐怖，因为她认为事情会变得更糟糕。早夜里夏德就会问起，《狼和七只小山羊》是不是一篇谋杀儿童的故事。他的父亲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就曾经唠叨类似的东西。或者就像阿尔玛去养老院看望他父亲时，一旦电视机里有一只公鸡打鸣，他也就跟着叫起来。等待吧，一切肯定会再次出现。只会早不会迟。她在床上不安地辗转反侧，想找到舒适的姿势，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她只好半趴着躺在床上，右胳膊侧弯在头上，右手指放在颈子和耳朵上，左胳膊横搁在胸部，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大腿就不会互相触碰。阿尔玛的头靠着床头侧向床沿的一边，半边脸压在床沿之上，这样可以分享到一些从床下飘上来的新鲜空气。再等

我们过得还行

几分钟。等待吧。

这一天。

是她女儿英格里特结婚的日子，也是她母亲去世的日子。在母亲的葬礼上，她在临时的木头十字架上看到烙上去的母亲的生卒年，这时她才发现母亲活了差不多有一百年。一百年。人们得在自己的脑海里设想一下。阿尔玛的母亲在小时候常常看着她的父亲，也就是阿尔玛的外公，他为了让光线更明亮一些，在一个玻璃球边干活。这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当时那条没有整治的维也纳河流旁边曾是她玩耍过的地方，如今地铁就从那里通过。她曾走路去上班，从靠近卡尔广场的地方，穿过伊丽莎白桥，那时上面竖着几个雕像，后来它们放在了市政厅的拱廊宫里。有时候她会谈起脚踏缝纫机，做姑娘时她被允许学习如何使用，那时候这东西还挺稀罕的。直到后来阿尔玛的母亲还很自豪地展示过用这架机器缝制的一条衬裙。人类已经投掷了原子弹，人类也已经从太空看到了地球。

“糟糕啊，”阿尔玛低声叹息道，仿佛无声的思考还不够。

阿尔玛甚至看到那个收大粪的人过来了。他摇着一个很大的黄铜铃。她的母亲端着个臭烘烘的便桶走下来，赏赐给这个粗鲁的收大粪的人两根香烟，好让他倒完粪便后能把桶从车上递下来，而不要扔到地上。砰！七十年已经留在身后，也许说自此过去了七十年更好。因为“留在”听起来好像人们可以走回去带上它。阿尔玛这年将要 75 岁了，里夏德不久就要过 82 岁生日了。她清楚人们可以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很多人会为这个年龄还能活在世上感到庆幸。可是，一旦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年龄超过了其他人只能徒然期望活到的八十岁，那么，人们就是想到其他比自己运气欠佳的人，也不会从中得到什么安慰，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轻松。

自从里夏德脑子不好使以后，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早就显现的衰老现象并没有让人很不舒服，倒是现在他的健忘不但令他魅力尽失，而且让他变得鸡皮鹤骨、老态龙钟。里夏德走路时膝盖发软，拖着鞋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用眼睛看仔细，好像每一步都可能中途夭折。死亡对里夏德来说，已经不再是人们一步一步迈向的终点，而是近在咫尺的、他必须顾及的威胁，如果他还想做些超出眼前时间范围的计划就更危险了。这个他并没有忘记（在他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的情况下），里夏德对摆在他面前的未来再次拥有一种新的时间感。要算出所剩下的年头好像运用儿童准则才适合：如果掰手指都算不过来，那就不知道该是多少，也就不需要动脑筋去想了。如果情形还好，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否

则倒过来数，四，三。已经离到头不远了。

阿尔玛凭直觉知道里夏德以这样的量数级进行思考。尽管他固执地排除这个话题，但她在至少同等程度上明白，对于里夏德来说，剩下的期限不论是从长度还是从它的质量考虑都不值得欢呼。也许这也是他为什么感觉起床困难的原因之一。很少见他十点前起床。阿尔玛很想弄清楚里夏德在他的房间里是怎样打发这许多时光的，他是不是也和她一样被类似的问题折磨着。但极有可能的是剩下的气力只够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希望一切一下子转好：回到从前。只要我坚信这一点，一切都会回到从前。阿尔玛，她过去从来就不是个爱睡懒觉的人，现在更是喜欢每天早早就起来。她喜欢能够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独享房子和花园。连带着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对早年上公立学校岁月的回忆。那时候小孩子们也诵读经典作品：人们擦肩而过，无视他人的痛苦。或者类似的东西。她早上会想起这样的事情。早上的想法走得真够远的，她觉得，比晚上要远。她得承认，这是她早上不去帮里夏德起床的原因之一，尽管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有点卑鄙。

她坐起来，从被子里伸出两腿。两手抓住床沿，懒懒地蜷着身，弯着腰，头深深地埋在肩膀里，眼睛望着大腿根，带着蓝色小花的睡衣绷在上面。过了一会儿，她撩开搭在面颊上的灰白头发，从沙发上拿起晨衣，快速披上，走到窗前，打开窗。两只鸟儿掠过雾蒙蒙的天空赶在天亮前向西飞去。阿尔玛望着它们远去，然后目光向下划出一道弧线，望向花园里的养蜂房，一个小时后她要在那里开始工作。天气预报预计未来几天的天气将会好转。天色慢慢地明亮起来。养蜂房被太阳几乎晒黑了的板块在夜里更是吸足了黑暗。但是门边浅绿色的百叶窗和屋顶瓦上的青苔已经闪烁出水样的清澈光芒，在树冠阴影下的部分变得模糊不清。她的目光再次投向养蜂房，蜂房非常粗笨地、僵直地矗立在伸展开来、簌簌作响的树杈下，侧面看上去状如字母 π ，它和这个数字一样不可理喻。阿尔玛想，这个小小的养着六群蜂的简易棚让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地不停忙碌：真够惊人的。

昨天《养蜂报纸》报道了关于如何阻止蜜蜂分群的最新成果。

但是假若在相关的蜂箱里，蜂王若已经从蜜蜡封护的蜂巢中孵出，报纸上的报道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接着只能建议采取暴力手段。杀死蜂王。要不把蜂箱里的蜂王隔离起来或者在蜂箱出入口前安装一道封锁栏杆。这些全是每个人多年来遵照的方法，但是在阿尔玛学习养蜂时却没有人谈及。那时阿尔玛甚至于经年累月地几乎没有一个蜂群，按当时说法，是有的蜜蜂先天就缺乏分群的欲望。

阿尔玛真想能够重新拥有这些蜜蜂。

现在她站在浴室里刷牙，她用冷水洗脸洗手，然后梳头。看着嘴唇上稀薄的晨光，她一定回想起年轻时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保留在她养蜂的工作中。但是如果她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时，内心就总有点垂头丧气，除了惊讶年轻时的阿尔玛在纵横的皱纹和褶子之中几乎无从辨认之外，再没有其他想法了。然而饶有兴味的是从照片上可以辨别出以前的她。当她把一些照片整齐地摆放成一排时，它们就好像组成了一份文献资料，展示着一个渐趋完成的建筑工地。晚上五点：咔嚓、咔嚓、咔嚓。但是在镜子前面的，什么也不是。在镜子前？我该是这个样子？当然是的。是啊、是啊、是啊。仔细地看看镜子里的这个人。那好吧：在镜子前，她得认输。这时一种凄凉的感觉向她袭来，好像自己被欺骗了，现在她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容颜。人总是禁不住为这些东西而费神，真是够荒唐的。要是一切能按照她的意愿，应当在某个时候出现这样的阶段：听天由命，放弃与持续的恶化达成妥协。涂脂抹粉并不牢靠，也不会让真实变得可以承受，它最多令人不习惯于真实，而让惊恐在清晨一再地重演。几年前里夏德就发出过评论，阿尔玛并不是出于偶然才将其记在心中的：要快乐就需要把事情看得比现实还美，并且，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丢掉这种能力，而且甚至慢慢走向反面。

就这么简单。

她希望重新拥有全部的她对里夏德满怀钦佩的时刻，几乎不可能。最近情况更是越来越糟。她常常难以相信，这个和她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男人，就是当年那个她为他的聪明才智着迷的年轻人，他的同学们叫他“罗马人”。那时的日子好像长得挥霍不尽。他们欣喜地期待未来。但是到底未来是什么？他们期待什么？她不再知道。而现在呢？过去常常是这样，现在也是，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

上周初，阿尔玛正在忙着做甜奶酪夹层蛋卷（现在里夏德变得爱吃甜了，他已经感觉不出酸的味道），他走进厨房找她，抱怨他的假牙断了。

“给我看看，”她说。

里夏德顺从地把假牙上面的一部分取出来，递给她。

1955年因为一颗化脓的白齿，里夏德参加签署奥地利国家公约的庆祝活动的计划泡汤了。因此，在所有的官方照片和电影上都看不到他的身影。对于丧失了这次抛头露面的机会他气得咬牙切齿，这次缺席也令他无法参与到历史成就之

中，在拽掉这颗牙之后，又有两颗牙开始化脓，因此里夏德决定装上假牙避免自己再受同样的痛苦。尽管从众多方面来说（应该是各个方面），阿尔玛都认为这种反应是愚蠢的，但是她无法劝阻她丈夫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在一次延续到午夜的治疗中，里夏德让牙医把颌骨两边的牙齿全部清理掉。听说尽管拔牙的过程非常疼痛，他还是睡着了好几次。阿达梅茨医生的女助手必须多次用擦玻璃用的喷水壶向部长先生喷水，唤醒他。据说作用持续不了多久。真正滑稽的是，如果那时有些滑稽的话（那时，不是今天，在今天好些事都显得滑稽），里夏德因为这个小小插曲很快就得到了高度评价。里夏德在阿达梅茨医生的诊室中鼾声回荡见诸报端，报道中，人们把他对睡眠的需要（其实“昏厥”这个概念更能说明当时的状况）同舍己为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在里夏德离职的祝词中，他的牙齿甚至被拿来和外交部长菲格尔的肝脏相提并论，后者的肝脏在与俄国人谈判期间受到损伤。其中可是相当程度有讽刺意味，阿尔玛认为。

“真是废物，”里夏德在上个星期骂道。他看上去怒气冲天。

“你现在不要这么激动，”阿尔玛说，她用手指小心地旋动牙齿的上半部。

一直都还是那副假牙。五十年代的时候，它和一辆轻摩一样昂贵，奥地利手工制造，并且借鉴了当时还很年轻的苏联航空技术。但是这件令人惊奇的所谓精心之作不可能永久耐用，七十年代中期阿尔玛就多次软硬兼施试图劝说里夏德换用一副新款的假牙，而他却装聋作哑。尽管他常常搞不定这些牙齿，他突然表示这些牙齿不能咬合。假牙经常不是戴在嘴里，而是放在裤袋里，他常常会坐到假牙上面，但遗憾的是从来也没有发生更为令人气恼的事情。

这次他过来时，阿尔玛希望这副与签署奥地利国家公约有纠葛的牙齿可以结束使命了。但是，经过里夏德要求鉴定后，只能得出这样的论断：里夏德怀疑的裂缝只不过是与上颚相适应的高低起伏而已。

“说不上是坏了，年久磨损，保养欠佳，这倒是肯定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里夏德问，眼睛里充满无法形容的惊讶和早已成为习惯的失望，好像他在这个荆棘载途的世界中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明白阿尔玛的不良居心。

“那就是说你真的可以感到高兴了。就其构造而言，你的假牙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还依旧无可挑剔。如果我们还能有它们的一半寿命的话，我们就应该高兴了。”

“胡说八道。我觉得，我应该期望它们还能坚持几年。”

阿尔玛试图客观而简要地向他说明，这一方面和沟槽有关，另一方面和各种积垢有关。现在所有的阴影部都出现了棕色的沉积物，从前面看上去像腐蚀斑，在后部和臼齿一起纠结成了一团混合体。她的言语中没有表现出她的反感。然而她的解释带出的同情的目光、轻蔑的手势、施舍般的答复，所有这一切都透露了她的头脑中与此并无二致的想法。

这根本就是她一种顽固的成见。她说的一切最后都是可笑的，要不就是陈词滥调，或者夸张走了样。你什么也不懂，是她最常听到的话。带着自以为聪明的部长式的装腔作势。总是这一套。老是这样。她早就对此没有感觉了。因为每次反驳都必然会招来标准化的论据，就是她（阿尔玛）得了被迫跟踪妄想症。反驳又能怎么样呢？不值得去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适应这样的角色的。里夏德的态度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男人们的特点，这并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一类男人的专利，只不过是在他们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样的解释令她感到满意。这个特点和这些男人还是男孩子时在他们所谓体面的家庭和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关：女人应当操持家务，偶尔用来干干房事（但不要太频繁，即使做也得匆匆），她们是用来生儿育女的，不需要什么聪明才智，因为必要的智力可以通过一家之主的偶尔在场得到补充。或是一切通过纯粹的心灵感应得到传授，因为反正户主是不和孩子说话的。涉及做决定、财务和技术方面的事情女人们就要闭上嘴巴，是的。住嘴。阿尔玛太晚了才发现，她太多次的闭口不言，引起的错误不仅仅一个。第一次在1938年，就在并吞^{〔1〕}不久，里夏德出于从未彻底澄清的缘由把她母亲经营内衣和床上用品的店铺出售给一家连锁店，将阿尔特霍夫的名字从商业登记注册簿上划掉，尽管当时也有很多犹太人商店被接管，各个商家开始争抢更好的地段。阿尔玛并不完全相信，里夏德既不愿意站到新的主人那边，也不愿意换到德意志帝国制袜工业的一边。不过，她也从未弄清楚，可能隐藏在这背后的缘由。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是某个没说出来的固执之见，这种执拗，至少在经过了令人难忘的将近十年之后得到了回报。对里夏德来说，晚了一些，但终究还是有的。里夏德从来不必为1945年前的仕途岁月作任何解释。只不过阿尔玛的兴趣却停滞不前，即使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勒维医生那里买来的蜂房可以部分地补偿卖出的店铺，成为女主人新的、没有特别要求的、在自家的花园里就可以从事的工作。

〔1〕 德国1938年并吞奥地利。